

论孙武军事思想中的仁德

张 杰¹, 张 斌²

(1. 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淄博 255049

2. 淄博市临淄中学, 山东 淄博 255400)

[摘 要] 孙武生长于齐、建功立业于吴,他在春秋时期因帮助吴王夫差大败楚国而名扬天下,又因其名著《孙子兵法》而被誉为兵家鼻祖,流芳百世。孙武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安国全军”的仁德基础上的大智慧、大谋略,因此文章从孙武合道的战争观、慎战的国防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军事境界、对君王和将领的严格要求及其对当代战争的启示等五个方面来论述孙武军事思想中的仁德。

[关键词] 孙武; 军事思想; 仁德; 智慧

[中图分类号] E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40(2010)05-0046-04

孙武,生长于齐,建功立业于吴。中原地区的齐鲁文化与南方地区的吴文化共同孕育了孙武这位春秋时期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因助吴败楚、辅佐吴王夫差确立了春秋霸主地位而在当时扬名天下;又因其名著《孙子兵法》而被称誉为兵家鼻祖,流芳百世。孙武的军事思想因其谋略突出而被班固列为兵权谋家的代表。然而孙武的军事谋略与普通的军事谋略不同,这种谋略是建立在“安国全军”的仁德基础上的大智慧、大谋略。虽然学者对孙武的军事谋略关注较多,但对其军事谋略中的基础即仁德关注得则相对较少,本文正基于此,欲从孙武的合道的战争观、慎战的国防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军事境界、对君王和将领的严格要求及其对当代战争的启示等五方面来论述孙武军事思想中的仁德。

一、孙武合道的战争观

孙武的战争观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获利。这在《孙子兵法》中有详细论述。如两军交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1]223}“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1]224}这与“以仁为本,以义治之”^{[2]1}古战争观相比,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孙武的战争观除了强调获利

之外,仍继承了古代重仁、义战争观,这突出表现为其合“道”的战争观上。孙武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而战争之前要从五个方面考察战争的胜负情况。这五个方面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1]11-12}可见孙武把道作为战争制胜的首要条件。^{[3]3}什么是道?张预解释为“恩信使民”;杜牧解释为“道者仁义也。”^{[1]3-4}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对此,贾林则解释说:“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使士卒怀我如父母,视敌如仇雠者,非道不能也。”王皙则说:“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1]4}我们由孙武本人及张预、杜牧、贾林、王皙等历代的解释可知:孙武的“道”是指以仁义为主的与百姓“同利共患”的民心。可见孙子虽然强调战争以获利为目的,但所获之利应顺乎民心,必须与民族、国家、百姓的利益一致,因此孙武强调战争一旦非打不可,必须以“安国全军”为上。

二、慎战的国防思想

孙武认为战争首先要合乎以仁义为主的道。

[收稿日期] 2010-06-21

[第一作者简介] 张 杰(1972—)男,山东荣成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编审,主要从事先秦思想史及地域文化研究。

但战争既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又要耗财耗利,因此他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既不回避战争即重战,又主张慎战。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 1}战争首先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既要重视,又不可不谨慎。又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1] 22-23}战争必须消耗大量的物资费用,这是慎战的又一重要原因。他主张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考察战争的致胜条件。“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武注重在此基础上的“庙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1] 9-11}对此,李筌解释说:“夫战者,决胜庙堂,然后与人争利。凡伐叛怀远,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这所出,中外离心,如商周之师者,是为未战而庙算胜。”^{[1] 21}可知,孙武意识到战争于国于民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不重战。但战争必须以损耗人力、物力为代价,他又站在国家、百姓安危的角度主张在战争之前要认真进行以合道为首以“五事”为内容的“庙算”。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战争境界

战争是以流血为代价的,孙武既不回避战争,又主张应该慎战。然而一旦战争开始,他主张战争应该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胜利。他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橧轘辘,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闾,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1] 35-39}孙武认为当时战争最普遍的方法即以牺牲敌我双方大量将士的方法来强攻城池,是最不可取的。他主张通过外交、计谋、军队本身建设等方面来创造致胜的有利条件,这就是孙武所谓的“全胜”思想。《孙子兵法·谋攻》载:“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解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的全胜从大处讲是全国、全军,从小处讲是全旅、全卒、全伍。因此他虽然在实际行动中不得不通过破国、破军等手段达到助吴败楚的战略目的,但

从内心深处他仍认为这并非他追求的理想战争的境界。他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1] 40-42}可见孙武理想的战争境界应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达到占领敌方城池、打败敌方军队的目的,孙武将这种方式称之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孙武并非只是一位通过战功而达到个人高官厚禄目的的战争狂。他的理想中的战争应是尽量减少己方的伤亡及损耗,这也是他的仁德的集中体现。

四、对君王、将领的严格要求

“不战而屈人之兵”虽然是孙武的理想战争境界,但面对残酷的现实,孙武不得不通过“外交”、“计谋”、“军队建设”等手段尽量减少己方的伤亡。然而无论是“外交”、“计谋”、“军队建设”都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及统帅军队的将领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孙武对君王、将领的素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孙武首先要求君王要熟知战争规律,不能无故挑起战争。《孙子兵法·谋攻》载:“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糜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掌握军、政大权,他们应根据战场的现实情况决定军队的进退及其他事情及出兵的时机,如果君王掌握得好,己方军队会轻易战胜敌方;否则,即使己方已经形成有利态势,也因为君王的瞎指挥而使将士疑惑,使战争功败垂成。《孙子兵法·火攻》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充分说明了君王不能因私怒而兴师动众,否则必然造成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

其次,孙武要求掌握军队的将领既要熟知战争谋略,更要在战争中爱护士卒,杜绝无原则地随顺君王的意志。“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

危之主也”。^{[1]33}“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1]46}统帅国家军队的将领是国家栋梁，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安危，其地位非常重要。孙武认为将领应该具有“智、信、仁、勇、严”五种基本素质，才能承担起保国安民的重任。孙武认为这五种基本素质中尤应看重“智”与“仁”。孙武认为将领没有智，就不能掌握“知彼知己”、兵贵神速、“致人而不致于人”、以逸待劳、“我专敌分”等致胜谋略，就无法在战争中获胜；孙武更认为将领应具有仁德，应该善待士卒，只有如此士卒才能在关键时候出生入死、奋力杀敌。“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1]172}孙武除正面强调将领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基本素质之外，还从反面说明将领如不具备这些素质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他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1]140-143}他总结出将领易犯的五种错误：“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即生性有勇无谋、贪生怕死、过于清廉自洁及过分爱护百姓，这五种过失都会造成战争失败，身死国亡的严重后果。由此可以看出，孙武强调将领的素质并非偏重于“智、信、仁、勇、严”中的一种，而是五者具备，才是一位合格的将领。正因为如此，孙武认为君王选择带兵的将军应该非常谨慎。他说：“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1]172-176}战争中出现军队“走”、“驰”、“陷”、“崩”、“乱”、“北”六种失败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将的智谋、性格等方面的缺陷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为对家、国安危负责，孙武认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统军将领不必一味听从君王的命令，而应根据战场出现的新情况谨慎处理。他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1]131-135}又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

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1]177}可见大将统兵作战必受命于君王，但因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不受君命，但受与不受的前提是“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即对君王国家有利，对士兵有利。

我们从孙武对君王、将领的严格要求可以看出其超人智慧中渗透着的仁德。

五、孙武军事思想中的仁德 对当代战争的启示

孙武的军事思想产生于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虽然距今年代久远，但因其智慧超群，其军事思想或被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广泛接受，成为他们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常识，或对他们治国、从政、经商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成为他们强国或事业成功的法宝。然而纵观当代战争，尤其是新发生的影响较大的美伊战争的得与失，我们可以看出孙武军事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仁德观的重要性。

我们从美伊战争的进程来看，美英联军在运用战争手段取胜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这与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谋略有异曲同工之妙，^[4]甚至单从战争的手段来看，美英联军几乎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具体表现为：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仅用了 42 天几乎接近“零伤亡”（139 人）的微小代价，迅速颠覆了萨达姆政权，^[5]达到了战争的目的。因此如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美英联军在战争战术的制定与应用上是比较成功的。

然而如从战争观的角度来看，美国发动的美伊战争恰恰违背了孙武主张的合道的战争观。不可否认，任何战争都是以获利益为目的的，但获利必须符合道义。而美国发动的美伊战争却在这方面差强人意。从国际上来看，美英等国在发动战争时，“罔顾国际舆论，绕过联合国，推行单边主义，依恃自己的强大军事实力，希望通过单纯军事暴力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显然是违背整个人类社会良知与公义的极端做法，是对国际法则与和平诉求的严重践踏”；^[4]从国内来看，美国政府当时“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伊拉克不仅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和 9.11 的罪魁祸首基地组织保持联系”，从而用欺

骗的手段获得了美国人民对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支持。^[6]

美国发动的美伊战争从长远看是为解决中东民主和控制石油资源的,从短期看是为了解决当时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和刺激经济走强。^[7]但由于不符合道义,战争之始就受到国际上有识之士的指责,战争之后,“当美军在伊拉克没有搜查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发现所谓的萨达母屠杀民众的‘万人坑’、更无伊拉克和基地组织联系的实据后多数美国人民才开始对战争持怀疑立场,并逐步演变为反对战争”,据学者研究表明:在2004、2005、2006三年中的民调显出分别有67%、56%、67%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拉克进行的战争,进而成为导致“共和党在2006年的国会选举中惨败失去对两院长达12年的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不但如此,战争对美国及伊拉克两国的经济、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军虽然在对伊战争中仅有139人伤亡,但战后六年来,美军约有4200名士兵死亡,3万多名士兵受伤。更为严重的是,“加上2008年6月布什的2000亿美元拨款,用于伊拉克战争的经费已经达到8000亿美元。在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每个月要花掉120亿美元。美国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17年,伊拉克战争将耗资1.68万亿美元”,这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并成为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伊拉克则有60多万人在美伊战争的战火中丧生,难民有400多万人,其中200多万人流亡国外。伊拉克的公路、学校、医院、博物馆遭到破坏,居民生活缺水少电,致使伊拉克的经济崩溃,并导致伊拉克政局的严重混乱。据学者统计,从2003年6月至2008年10月共有8792次武装袭击事件,平均每月135起、每天4起。可见伊拉克政局的混乱。^[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将美伊双方称之为“伊拉克人的七年之痛、美国人的七年之苦”,^[9]毫不为过。

可见美国政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骗取美国人

民支持对伊战争,但美国人民发现真相之后立即加以反对,从而成为导致长期执政的共和党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惨败;美国政府只顾经济利益、不顾道义发动美伊战争使美国、伊拉克双方都饱受战争之苦,从而给美国带来了七年之苦,给伊拉克带来了七年之痛。这从反面证实了孙武军事思想中的仁德的重要性。

我们由孙武军事思想中的仁德内涵及对当代战争的启示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有大智者必有大德。正因为他们的智慧是建立在大德的基础上,因而这种智慧能够超越时空,即使经历几千年的风雨,仍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的人类族群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与战国时期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以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的阴谋、诡计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这种建立在仁德基础上的大智慧值得我们大力提倡。

[参 考 文 献]

- [1] 曹操,等注. 孙子十家注[A]. 诸子集成(第6册)[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 [2] 钮国平. 司马法笺证[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 孙子兵法新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 黄朴民. 从《孙子兵法》基本原则看美英攻打伊拉克的得与失[J]. 博览群书,2003(5).
- [5] 张东亮. 一年后重读美伊战争——美国“赢”了吗[J]. 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1).
- [6] 方强. 从美伊战争看“无知”民主的危害[J]. 社会观察,2007(5).
- [7]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近期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课题组. 美伊战争与美国季度经济形势[J]. 经济研究参考,2007(25).
- [8] 蒋义文. 美伊战争经济再评估——伊拉克战争六年祭[N]. 科技日报,2009-3-30(12).
- [9] 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 伊战七周年:伊拉克人的七年之痛,美国人的七年之苦[EB/OL].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21/124419909532_sh.htm

(责任编辑 郑东)